

以阴阳论灾异——《汉书·五行志》 中董仲舒的灾异诠释

杨焱恒

马来亚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严家建博士

马来亚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内容摘要：

先秦时代的书籍不乏对各种灾异的记载，古人都认为灾异是来源于“天之谴责”。《汉书》首创的“五行志”章节记载了春秋时代至西汉时期发生的各种灾异，并附上西汉诸子相对应的诠释。从比例上来看，刘向、刘歆和董仲舒的灾异诠释占据最大的篇幅。大儒董仲舒结合先秦儒家知识体系和阴阳五行说，对种种匪夷所思的灾异作出符合天意的诠释。本文针对《汉书·五行志》辑录董仲舒的灾异释条，探讨董仲舒如何运用“同类相动”的原理来论述人事对灾异的影响。

关键词:

董仲舒、灾异、阴阳、《汉书·五行志》、同类相动

前 言

在《汉书》之前的司马迁《史记》是没有“五行志”这个章节，实乃为班固独创的史书体制。有学者认为司马迁不热衷于灾异事例，而是继承了来自于“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的史学精神。¹其实《五行志》的创制反映了汉代谶纬文化的历史背景，当时的君臣皆以灾异论述作为朝廷上斟酌讨论的重要议题。因此《五行志》被认为是“创为阴阳五行灾异之说以恐之（君主）”，并被痛批“此说绝无义理”。²汉成帝即位后，刘向官拜中郎，随后收集了上古以来从春秋时期到秦汉之间有关符瑞和灾异的历史记载，并通过推演算法，写成十一篇文章。班固在他的基础上结合董仲舒的释条，写成《汉书·五行志》。虽说他是新史书体制的编撰者，但这并不代表他是

¹ 苏德昌，《汉书·五行志》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页4。

² 杨树达，《汉书窥管》，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页132。

其中最迷信的一个。班固创制这个新“志”的意图在于“遵循《洪范》大法、《春秋》精神以彰‘王事’，举咎征以明‘圣王之道’”（游自勇，2007）。新体制的创立，背后反映的是当下“以灾异论政”的时代背景。班固作为史家，他有义务记载这些渗透上层政治和下层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才符合史家的著书精神。早在班固之前，大儒董仲舒就很注重灾异的发生。他说：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从起，亦未可与论异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故书日蚀、星陨、有彗、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雉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徵。（《春秋繁露·二端》）

《汉书·五行志》共有五个章节：上篇为古人按照《尚书》记载的洪范九畴里的第一畴“五行”，记载了和五种属性有关的灾异；中之上篇、中之下篇和下之上篇则按照第二畴“五事”，记载了和不符合五种行为规范的灾异；最后的下之下篇则记载了天象的异象。这些章节主要记载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三位学者的论述，另外也收录了眭孟、夏侯胜、

京房、谷永、李寻等其他学者的论述³，甚至也收录班固的看法。对于诸如没有出现人名的引说，比如“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二月”的记载是班固自己的评论。⁴《汉书·五行志》也偶有出现“一曰”或“或曰”等不知名人物针对灾异所做出的评论，说明了班固也将当时民间所有的灾异评论都记录下来。另外也辑录了相关的其他古籍经文，比如《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易经》、《京房易传》、《洪范五行转》等对不同灾异所作出的解释。

《汉书·五行志》的体例以“经”、“传”和“说”为主，其中“经”是《尚书·洪范》的文本，“传”是夏侯始昌所推、后传至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说”则是西汉学者从自身主观诠释《五行传》的见解⁵，董仲舒的灾异释条就属于这个范畴。班固以五行（木、火、土、金、水）、五事（貌、言、视、听、思）和皇极作为区别灾异类型的主题，配上先秦和西汉发生的灾异事件，排列成与人事有前后呼应

³ 《汉书·五行志》上篇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髓仲舒，别向、歆，转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⁴ 游自勇，〈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⁵ 以上更多的细节更参考：苏德昌，《汉书·五行志》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

的因果关系事件表。五行根源于地面上的五种属性, 结合五事, 也即社会中需要遵守的社会行文规范, 形成一套彼此呼应的“大自然-人事”网络。班固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代表天道的皇极概念, 使得五行五事不再局限于平面上的理论, 而是能够突破二度空间上接天道。《汉书·五行志》灾异学建构法为“能够涵摄上下四方、自然人世万有的立体宇宙图式。⁶在这篇论文中, 我们把焦点放在董仲舒独自的释条, 或者和刘向一起的释条。以下图表为董仲舒分布在《汉书·五行志》中的释条数量:

篇目	内容	董仲舒合刘向释	
		董仲舒释条	条
上篇	五行之木	-	-
	五行之火	6	4
	五行之土	1	-
	五行之金	-	-
	五行之水	4	3
中之上篇	五事之貌	1	-
	五事之言	2	-
中之下篇	五事之视	3	3
	五事之听	6	2
下之上篇	五事之思	1	6
下之下篇	建用皇极	19	21
总数		43	39

⁶ 苏德昌, 《汉书·五行志》研究, 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 2013年, 页5。

从图表计算，我们可以得知董仲舒对于《春秋》灾异的释条多达 82 条⁷。董仲舒曾说过“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泐而王法立”（《春秋繁露·玉杯》），他认为《春秋》的记载方式是融会贯通所有历史事件，从中寻求这种记事规则。之后，《春秋》将相关记载比列在一起，将相同的内容归为同类，并分析其条理，以此剖析非经典原有的记载。我们相信董仲舒将这套研究方法应用在本身的理论建构上。

从班固引用不同学者的释条来看，赵濛（2007）认为董仲舒的学说并没有在西汉时代获得独尊的地位。⁸其实就如这张图表所显示的董仲舒释条数目，加上不在统计范畴内的刘向和刘歆，他们的释条是占据了《汉书·五行志》很大的篇幅，远远超越其他学者的释条。班固引用三人的释条可以从《汉书·五行志》上篇的记载得到印证：“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刘向治谷梁春秋……至向子歆治左氏传”。显然，董仲舒、刘向和刘歆分别是《春秋》治学三个派系的代表人物，班固引用他们的释条的目的在于凸显三家理论的异同。

⁷ 此数据和崔涛（2013）的资料一致。徐复观认为“凡董仲舒专言灾异的约七十七事（李维武，2002，页 227），游自勇（2007）仅算出 81 条释条，皆有纰漏。

⁸ 赵濛，〈《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 3 期。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汉时代《春秋》三家的学术势力是平等的。

董仲舒作为公羊学者，为研究《春秋》经书中引用阴阳学说的第一人，在汉朝被尊称为“儒者宗”。在《汉书·五行志》中，班固经常引用“董仲舒认为”或“董仲舒、刘向以为”等涉及第一叙述视角的论调来讨论特定的灾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班固推崇董仲舒的举动：第一，整篇《汉书·五行志》中唯独董仲舒的学说是被视作权威的参考点，比如桓公五年“秋，螽”中的“诸螽略皆从董仲舒说云”、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中的“诸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厘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和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的“董仲舒说略同”，以及其他六宗灾异的“董仲舒指略同”。班固的历史背景离刘向和刘歆生活的时代不远，却以董仲舒的论述作为最终参考的资料来源，可见那时候的灾异观学术风气以董仲舒的学说为尚。

一、天人之间阴阳的同类相动

董仲舒将人与天的关系比喻成曾祖父与曾孙的关系，天人之间不再以自然与人文作为区隔，而是具备了亲情制度的深层关系。但即使他不断强调何为“为人者天也”，他需要深入解释为何是“为人者天也”，而不是停留在理论的表层上。他以阴阳学说作为切入点，试图验证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联系。他认为天的阴阳可以影响到人体内的阴阳，有如今日物理学中的“共振效应”。他说：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以阴气为例，人的阴气会呼应天地的阴气而跟着出现，就如同人总是在雨天的时候想入眠，是因为人体内的阴气和天地的阴气产生了连结。董氏的世界观犹如一个大循环系统，阳气与阴气在天地与人之间环环相扣的连结之中生生不息。在这个基础上，灾异与人的关系也顺理成章地连接上了。在《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引用阴阳理论来讨论春秋时期一些特定的灾异，他认为这些灾异是个人的或者群体的情绪引发的。在下面的讨论之中，我们会按照不同的范畴来深入理解董仲舒的灾异理论。

（一）阳的极致——“炕阳”

《说文解字》释“炕”为“乾也，从火亢声”。“炕阳”一词原指干涸、枯涸，后比喻统治者残暴专横，对于臣下百姓毫无恩泽，也用来比喻张皇自大的样子。在董仲舒的灾异理论中，“炕阳”指的是阳气极盛的状态。

1. 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董仲舒以为方有宣公之丧，君臣无悲哀之心，而炕阳，作丘甲。

君臣没有对鲁宣公的薨逝感到悲哀，反而积极筹备战争之事。董仲舒认为“作丘甲”是张狂自大的举动。冰为极阴之物，遇上“炕阳”的情势即被盛阳给消去，因此才会造成没有降雪的现象。

2. 厘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刘向以为齐威既死，诸侯从楚，厘尤得楚心。楚来献捷，释宋之执。外倚强楚，炕阳失众，又作南门，劳民兴役。诸雩旱不雨，略皆同说。

董仲舒认为“大旱，阳灭阴也。”（《春秋繁露·精华》）而阳灭阴者是“尊厌卑”的一种表现。这场大旱和当

时的国际局势有莫大的关联。齐桓公在僖公十七年（公元前）死后，原本臣服齐国的其他诸侯国纷纷见风转舵，转而跟随国力强盛的楚国。以下为整个事件的情况：

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僖公十七年）

↓

冬，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僖公十九年）

作为周朝姬姓诸侯国，鲁国外倚异姓诸侯国楚国，被认为是有损华夏诸侯国的颜面。鲁僖公选择在政治局面上自我矮化，必使鲁国人民愤怒不已。尔后在僖公二十年（公元前）又劳民伤财新建南门。鲁僖公处理两件事上表现出张皇自大的态度，因此导致了这场大旱。

3. 厘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鵙退飞过宋都”。董仲舒、刘向以为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将自败之戒也。……天戒若曰，德薄国小，勿持亢阳，欲长诸侯，与强大争，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齐威死，伐齐丧；执滕子，围曹；为孟之会，与楚争盟，卒为所执。后得反国，不悔过自责，复会诸侯伐郑，与楚战于泓，军败身伤，为诸侯笑。

当时人们观察到有六只鵙鸟以倒退的姿势飞过宋国国都，估计是陨石落地造成的巨大气流所致。六二人认为这次的异

象预示了宋襄公“欲行伯道将自败之戒”。宋襄公想要实行大道，可是实力不那么强盛，若宋国想要与强大的诸侯国竞争一轮，无疑是会遭受其害的。后来宋襄公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不断用兵力宣扬国力，比如乘齐国国丧之际讨伐齐国、俘虏滕国国君、用兵包围曹国等。宋襄公在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上取得胜利后，非常沾沾自喜，以至于他于公元前639年在孟（今河南睢县）会盟诸侯的时候，不畏惧与楚国争做霸主，结果被抓获。后来宋襄公被释放回国后，没有自我检查，接着又会合诸侯讨伐郑国，与被前来救援的楚国在泓（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大战。楚国和宋国国力悬殊，宋襄公不但折损兵马，连自己也丧命于这场战役中。宋襄公国力不及，却妄想与其他诸侯一争长短，即使想要实行霸主之道，也注定走向失败的结局。

（二）阴的极致——“阴气盛”

董仲舒认为“大水者，阴灭阳也。”（《春秋繁露·精华》）而阴灭阳者是“卑胜尊”的一种表现。除了大水，董仲舒也认为日食属于同样的情况，都是“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是“不顺于天”（《春秋繁露·止雨》）。水为阴之物，而雪更是阴之极，因此大雪和水灾会被认为是“阴气盛”的现象。

1.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董仲舒以为象夫人专恣，阴气盛也。

这里的夫人指的是鲁桓公夫人文姜。十月尚未进入冬季却开始下起雪来，董仲舒认为这是文姜专横放肆，导致“阴气盛”的现象。其实这场灾异与“严公（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鲁夫人淫于齐”。根据史书记载：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春秋公羊传·桓公十八年》）

《春秋左传》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解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

“鲁夫人淫于齐”指的是鲁桓公夫人，文姜回到齐国的时候和哥哥齐襄公乱伦的事件。当时鲁桓公得知内情后大怒

不已，齐襄公于是将计就计，安排一场盛宴灌醉鲁桓公，让公子彭生扶鲁桓公上车的时候趁机杀了他。事件的结果是齐襄公诛杀公子彭生以安抚鲁国人民的不满，但他和妹妹乱伦的丑闻就此被公开了出来。文姜罔顾人伦道德的行为显示她专横放肆的态度，因此造成了“阴气盛”的现象。

2. 严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为时鲁、宋比年为乘丘、鄆之战，百姓愁怨，阴气盛，故二国俱水。

鲁庄公十年和十一年，鲁国和宋国分别在乘丘和鄆这两个地方交战。虽说鲁国均取得胜利，战争的第一受害者永远都是以人民为先。两国百姓愁怨不断，累积的负面情绪造成阴气过盛，因此导致了两国都发生水患。

3.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不妇，阴气盛也。

董仲舒认为水患发生的原因在于夫人鲁庄公夫人哀姜淫荡放纵，不守妇道。哀姜还未嫁时，鲁庄公就多次前去齐国与她行房。后来哀姜嫁入鲁国后，又和庄公的庶弟庆父、叔牙私通。

4.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为先是一年齐伐晋，襄使大夫帅师救晋，后又侵齐，国小兵弱，数敌强大，百姓愁怨，阴气盛。

董仲舒认为这一年的大水和前一年的两次军事活动有关联。《春秋·襄公二十三年》载：

秋，齐侯伐卫，遂伐晋。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渝。

又《春秋·襄公二十四年》载：

仲孙羯帅师侵齐。

鲁襄公委派叔孙豹领军救援晋国，接着又委派仲孙羯带兵攻打齐国。齐国是春秋时代的大国，鲁国两次派兵挑战齐国，有以卵击石之劣势。百姓之间的负面情绪累积起来造成“阴气盛”的现象。

5.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董仲舒以为季孙宿任政，阴气盛也。

季孙，“孙”为尊称，也即季氏，是鲁国卿家贵族。作为三桓之首，季氏的势力一直凌驾公室。董仲舒曾说“君为阳，臣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季氏理应对鲁国君主表达人臣之礼，以符合“臣兼功于君……阴兼功于阳”的天道原则。季氏无视公室的存在，一直把持鲁国的执政，犹如“阴灭阳”之势，都是在下位者触犯在上位者，因此造成了“阴气盛”的现象。

6. 隐公三年至定公十五年之间的三十四宗“日有食之”

《开元占经·卷十·灾异对》记录了一段董仲舒对日蚀现象的解释：

日蚀者，阴气盛畜，渐夺君明，治道有失，臣专君政，出入为奸；则治道在上德不宣，下民常怨；当应析宠臣之势，减玉食之权，无忽谏，言大恶，在于任贤；则灾害不生也。

太阳为极阳之物，盛阳被暗影遮挡一直被古人认为是阳气被侵犯的现象。董仲舒就认为日蚀是“阴气盛”的现象，反映了君主的光辉被下臣遮盖。董仲舒讨论到隐公三年至定公十五年之间的三十四宗“日有食之”的这些例子中，都是

涉及到弑君、灭国、夷狄主上国、大臣僭越等“阴灭阳”的历史事件。

（三）阴阳转化——“积阴生阳”、“极阴生阳”

当阴气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出现的阴气是最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质变的状况，有如现代乘法运算中的法则“负负得正”，阴气转化成阳气。在以下“积阴生阳”和“极阴生阳”的例子中，为阴气转化而成的阳气都酿成了火灾。

1.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节三十馀年，又忧伤国家之患祸，积阴生阳，故火生灾也。

伯姬是鲁宣公之女，鲁成公之妹，她在成年后嫁给宋共公（？ - 公元前 576 年）。有一天夜里她的宫室起火，她却不着急逃命。对此《春秋公羊传·襄公三十年》载：

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伯姬遵守当时的风俗习惯，没有在傅母的陪伴之下不能独自在夜间出门⁹，结果烧死于大火之中。这场火患发生的起源不明，董仲舒认为是伯姬“积阴生阳”的原因。伯姬嫁给宋共公五年之后，后者就撒手人间，遗留伯姬一人守寡三十多年。在这段期间，她除了饱受思念之苦，同时她也担忧国家连绵不断的灾难和祸端。在两种极度抑郁的情绪累积之下，最终造成“积阴生阳”，触发了宫室的火灾。

2. 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徵舒杀君，楚严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至因灭陈。陈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

这场火患的源头来自于宣公十年“陈夏徵舒弑其君平国”事件。春秋三传对此事都有记载，其中《春秋左传·宣公十年》有最详尽的来龙去脉：

⁹ 徐彦疏“礼，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傅正其行，卫其身也。选老大夫为傅，选老大夫妻为母”。（李学勤，1999.，页 469）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徵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夏徵舒是陈灵公的堂弟，也是其司马。他射杀陈灵公的原因是遭受到极致的羞辱。《史记·陈杞世家》记载：

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

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都与夏徵舒的母亲，夏姬有染，三人甚至在朝廷之上穿着夏姬的衣服嬉戏，给当时任职大夫的夏徵舒难堪。后来三人在夏徵舒的家饮酒时胡言乱语，更坚定了后者的杀意。《春秋公羊传·宣公十年》载：

癸巳，陈夏徵舒弑其君平国。

夏徵舒成功报复，但其代价是陈国的政治局势变动。陈国的国势一直不明朗，身边有众多大国围绕。陈国动乱，给与楚国直捣龙门一个绝佳理由。《春秋左传·宣公十一年》载：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徵舒，轘诸栗门。因县陈。

第二年，楚庄王带领军队攻入陈国，将夏徵舒车裂于陈国城门。楚庄王假借诛杀不义之徒的名义，趁机占领了陈国的领土，将之化为楚国的一个县，使得陈国遭受灭国之灾。后来楚庄王听从申叔时的建议才将陈国复国，但那也是后话了¹⁰。除去了弑君之贼，却迎来了灭国之灾，陈国上下的臣民怨恨至极，因此他们怨毒的负面情绪累积到一个极限，“极阴生阳”造成了昭公九年的火患。

（四）阴阳失和——“阴胜阳”、“逆阴气”、“阴失节”、“阳失节”

¹⁰ 《春秋左传》载：“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徵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可乎，对曰，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

1.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董仲舒以为象夫人不正，阴失节也。

根据《春秋》的记载，这场在春季没有降雪的异象其实发生在鲁桓公十四年，不知何故《汉书·五行志》的记载出现错误。董仲舒认为这场异象和鲁夫人文姜行淫的行为有关，造成“阴失节”。

2. 严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麦禾”。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姜淫乱，逆阴气，故大水也。

这里出现两者矛盾的说法。《汉书·五行志》记载大水的出现大大破坏麦禾的收成，然而《春秋》三传的记载是“大亡麦禾”，并没有文献显示这场灾异是由大水所造成的。董仲舒认为鲁国夫人哀姜淫荡乱伦造成“逆阴气”的现象。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哀姜的事迹，兹不赘述。

3.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刘向以为时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师，明年复城郟以强私家，仲孙蔑、叔孙侨如颺会宋、晋，阴胜阳。

董仲舒认为当时鲁成公尚年幼，政权实质掌握在大夫手中。这里出现三件历史事件，我们按照惯例用年份顺序来看以下：

三年春，王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二月，公至自伐郑……秋，叔孙侨如率师围棘。（成公三年）

↓

冬，城郟。（成公四年）

↓

仲孙蔑如宋。夏，叔孙侨如会晋荀秀于谷。
（成公五年）

当时的大夫叔孙侨如和仲孙蔑在政治上有着非常活跃的表现，除了不断发动战争，还给自己的领地郟加强城墙来稳固实力。另外，这两人还以君主的名义，在境外进行国际交流。叔孙侨如和仲孙蔑种种行径无疑是僭越君主的权力，因此被认为是“阴胜阳”的表现。

4. 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董仲舒以为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又宋、卫、陈、郑之君皆荒淫于乐，不恤国政，与周室同行。阳失节则火灾出，是以同日灾也。

董仲舒认为四地发生的火患反映了“象王室将乱，天下莫救，故灾四国，言亡四方也”，是属于预兆性质的灾害。在当时，周景王已老迈，朝廷上有两派大臣分别支持不同的

继承者。以王子朝之傅宾起为代表的一派支持王子朝，而另一派则以大夫单子单穆公、刘子刘文公为代表支持王子猛。周景王突然驾崩后，刘子和单子趁机拥立王子猛为王：

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昭公二十二年）

王子朝不满，继而引发了长达十五年的“王子朝之乱”，直到在定公五年（公元前 505 年）王子朝被诛杀后才平息动乱。

此外，董仲舒也认为这场火患也反映了“宋、卫、陈、郑之君皆荒淫于乐，不恤国政”。我们或许可以从《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来探讨这一点：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为之歌《邶》

《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

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

《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

先亡乎”……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

乎，自《邶》以下，无讥焉”……

除了宋国的乐曲，季札对卫国、郑国和陈国的乐曲都做出了相关的评语，其中蕴含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意味。他认为卫国乐曲“忧而不困”，特意提到卫国初代君主的丰功伟绩，实则暗示卫国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他对郑国乐曲“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的评语，不讳言地批评郑国民不聊生的处境，已经达到近乎灭亡的边缘。最后他评论陈国乐曲“国无主，其能久乎”，也是针对当下陈国没有贤主的政治环境，质疑其能够延续悠久的国祚。由此可见，卫、郑、陈三国的内部腐坏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宋国的情形虽然不能确定，在“礼乐大崩坏”的春秋时代也可想象得出一二。

总的来说，周朝内部发生动乱，宋卫陈郑四国又不理政事。身为天下共主和周朝姬姓诸侯国，两者都违背了礼节，造成“阳失节”的现象。

二、结论

《汉书·五行志》记载了 82 条董仲舒单独或者董仲舒和刘向合著的释条。这些释条针对五行、五事和皇之不极等三种不同属性引起的灾异。董仲舒处理“火不炎上”和“水

不润下”引起的灾异现象时，更多倾向于使用阴阳理论来做诠释。他频密地使用“阴气盛”、“阳气盛”、“炕阳”等阴阳相关的诸辞来解释无冰、雨雪、火患、大水等诸般灾异。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针对五行五事的灾异提出了“五行”灾异成因和解决方法。他说：

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

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繇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赋敛，出仓谷，振困穷矣。火有变，冬温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土有变，大风至，五谷伤。此不信仁贤，不敬父兄，淫无度，宫室荣。救之者，省宫室，去雕文，举孝悌，恤黎元。金有变，毕昴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盗寇。此弃义贪财，轻民命，重货赂，百姓趣利，多奸轨。救之者，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水有变，冬湿多雾，春夏雨雹。

此法令缓，刑罚不行。救之者，忧圉圉，案奸宄，
诛有罪，旧五日。（《春秋繁露·五行变救》）

然而吊诡的是，我们无法从《汉书·五行志》庞大的例子和释条找到有关董仲舒引用五行学说来解释灾异的例子。就以严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麦禾”为例，刘向引用五行学说解释为“土气不养，稼穡不成者也”，而董仲舒则以“逆阴气”的角度来看待这场灾异。萨拉（1996，页 224）认为董仲舒没有如过去想象般一样致力于融合阴阳和五行思想的功夫。

无论如何，董仲舒以阴阳理论诠释灾异，并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作出连系，借此发展出一套“灾异—人事”的理论模式来劝诫当权者，是值得被肯定的贡献。从《汉书·五行志》中这些文字来看，董仲舒建立了一套庞大又完整的灾异理论，试图表达了他的道德史学观。董仲舒曾经写过一篇《庙殿火灾对》文，将春秋定哀两公时期的火灾和汉武帝时期发生在辽东高庙和高园殿的火灾联结起来，借以批判皇帝身边的佞臣。灾异和历史事件的连系不全是前因后果的简单逻辑关系。董仲舒利用“历史比例法（anology）”来推论灾异，并发展董仲舒灾异理论三部曲：

1. 先求《春秋》某件灾异之天意。（A 由于 B）
2. 次求现今某件灾异与《春秋》某件灾异为“同比”。（a 比 A）

3. 然后比例推求现今此件灾异之天意。(A 由于 B, 而 a 比 A, 故 a 由于 b)¹¹

对他而言, 所谓的人事因素触发火灾, 不过是他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平台。他解释历史上发生火灾的原因无论合理与否, 都大大为他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增加说服力。即使董仲舒在皇帝面前直接讨论灾异, 按理来说不会受到任何对付, 因为他的行为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思潮。然而因为《庙殿火灾对》这篇文章, 董仲舒被政敌主父偃攻击而几乎命丧狱中, 又被弟子吕步舒视为大愚那么问题就出在内容中。在这里, 徐复观提供了新的角度, 可供参照:

主父偃当时正是“近臣”, “处旁侧”, 所以他看了(指《庙殿火灾对》)引起嫉恨。因为牵涉到皇帝的祖庙, 所以主父可以告密, 而仲舒因之犯了死罪。因“高庙灾”和仲舒所说的诸侯近臣等, 实在关连得太勉强, 且认为祖庙烧得很好所以吕步

¹¹ 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2015 年。

舒认为大愚。而仲舒方正的人品，尊君的思想，及强干弱枝的主张，都可使武帝加以赦免。¹²

两汉臣民以借灾害上书的情形分为三种情形，分别为群臣对强臣僭权的批评、对外戚专权的批评、以及批评阉寺专权。¹³显然地，董仲舒是借火灾之名来攻击当时皇帝身边的强臣，结果敲醒了主父偃的警觉心。可惜的是董仲舒缺乏一些政治上应有的敏感度，以致于被政敌反咬一口，当然这是后话。不过我们能够从这则历史事件看到，董仲舒不是窝在家中空想理论的学者，而是结合古今，以古谏今，将历史留下来的借镜来解决当下的时事问题。以灾异论政事，在注重科学精神的后世眼中自然遭遇唾弃。我们做学问的，必须回到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考量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历史语境，才能客观还原他的思想脉络，摸清他的学说背后的真实意图。

参考书目

¹² 李维武主编，《徐复观文集（第五卷）》，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23-224。

¹³ 陈业新，〈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陈业新，〈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

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李维武主编，《徐复观文集（第五卷）》，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李学勤，《春秋公羊传——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苏德昌，《汉书·五行志》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杨树达，《汉书窥管》，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游自勇，〈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杨峻恒, 以阴阳论灾异——《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的灾异诠释

赵濛, 〈《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7年第3期。

Rethink the Relation between *Wenzi* and *Yantielun*

YEOW Jun Heng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YAM Kah Kean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Books in the Pre-Qin era have many records of various calamities and anomalies. The ancients believed that catastrophes originated from "the condemnation of heaven." "Treatise on Five Forces" initiated by *Hanshu* records various disasters that occurred from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attaches the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cholars. In terms of proportions, Liu Xiang, Liu Xin, and

Dong Zhongshu's catastrophe interpretations occupy the most space. The great Confucian Dong Zhongshu combined the Pre-Qin Confucian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and made an interpretation of all kinds of unthinkable cataclysm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Dong Zhongshu's disastrous explanations in the "Hanshu·Five Elements", and discusses how Dong Zhongshu uses the principle of "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Activate One Another "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nel on catastrophes.

Keywords

Dong Zhongshu, Calamities and Anomlies, Yin and Yang, "Treatise on Five Forces",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Activate One Another